

首次用小说完成故宫文物南迁叙事,《国宝》作者祝勇说——

读懂故宫,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

文物离开北平紫禁城,开始漫长的迁徙。2025年,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。是年春天,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、作家祝勇用本文开篇那个句子,展开了长篇小说《国宝》的叙事,为这部60万字的鸿篇巨制,埋下了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。近日,祝勇接受了新重庆—重庆日报记者专访。他说:“素以坚韧、忠勇著称的重庆,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”

记忆重构
“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,在我心里呼之欲出,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”

“600年的宫殿、7000年的文明,一个人走进去,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,立刻不见踪影。”从2002年的首部故宫主题作品《旧宫》出发,祝勇开始与故宫持续对话。20余年来,“故宫”已成为他鲜明的文学标签。

“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,是我写作的灵感之源。她不只是我的写作对象,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。故宫文物南迁历史非常重要,我将它视为立足故宫观察中国史的新探索。”两年前,祝勇以非虚构作品《故宫文物南迁》填补了南迁历史书写的空白;如今,两卷本的《国宝》成为了南迁叙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故宫文物南迁有多重要?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,故宫文物危如累卵。为安全考虑,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陈列所、颐和园、园子监等地的1.9万余箱,分批南迁:文物被运离北平,先至上海、南京,后又分南、中、北三路,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。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、四川、重庆、陕西汉中,最终转移至四川的巴县(今重庆巴南区)、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。这场历时20余载、横跨10余省市、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行动历经磨难,但相关文物几乎无一损毁、遗失,基本完整保存。

“站在今天来看,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。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今天足够久远,有关它的细节已漫漶不清;同时也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。因此,不断书写,很有必要。”祝勇说,非虚构作品完成后,他依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,“非虚构作品的主要任务,是对故宫文物南迁作一个大而整的脉络叙述,没

有足够的空间去挖掘人物的情感。故宫文物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,在我心里呼之欲出,我觉得不写小说不行。”

聚焦个体
“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、事、物众多,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,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”

过去20多年里,祝勇的故宫写作主要在散文领域。他认为,散文更多要依靠作者对于某个事物的感受,通过一种认知的思考来呈现文本,小说则要讲求叙事,在叙事之上,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人物的塑造。“小说要贴着人写,归根结底是要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,通过人物的精神面貌,来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。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、事、物众多,细节纷纭,如何从中找到一个故事主线、人物主角?我从参与文物南迁的学者、知识分子、工友中寻觅,最后决定聚焦一个普通个体。”

小说《国宝》围绕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,从他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。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、南京,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,分为北、中、南三条路线。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,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:沿陇海铁路西行,先存宝鸡,后穿越秦蜀古道,迁于汉中、成都、峨眉各处。

围绕那文松和身边人的视角,读者眼前展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图景:没有难民,没有枪炮,唯有穿草鞋的学者、扛木箱的挑夫、驾卡车的士兵,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。数十年间,过长江、越秦岭、入川渝,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、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山河图谱。无数无名的人参与运输,通过文学的显微镜,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“那文松”们重获面容。

重要节点
“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、包容精神,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坚实支撑”

书中对战时重庆的书写细腻而感人。彼时的重庆虽然随时可能遭遇日军轰炸,但市民生活却生动鲜活,大街小巷一派积极乐观

的景象。

为了故宫文物南迁写作,祝勇曾多次到重庆。在他看来,作为反映故宫文物南迁这一重大历史的长篇小说,《国宝》必然要有相当的笔墨来写重庆。“1937年,在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的背景下,已经从北平迁到南京的故宫文物紧急迁出南京,开始分成北、中、南三路进行西迁。中路是从南京出发走长江,经过武汉,抵达重庆;南路是从南京到武汉,向南经过长沙、桂林,再抵达贵州。但随着战局的发展,重庆、贵阳这样的西部地区也遭遇了轰炸,所以,重庆存放的中路文物,继续西迁到了乐山,南路的文物又从贵阳到达了四川巴县(今重庆巴南区)。抗战胜利后,北、中、南三路文物集中在重庆。然后,大部分文物又从重庆出发返回南京。所以,在故宫文物南迁进程中的西迁和东返两段过程里,重庆都是特别重要的节点。”祝勇如是说。

小说进入重庆部分时,为何以风和日丽起笔,随即笔锋一转,让主人公目睹一场狂暴轰炸的屠杀?“这是有意为之。”祝勇说,重庆自古为长江上游重镇,烟火繁盛,小说进入重庆,通过勾勒普通国民日常生活场景去跟侵略战争的惨烈形成反差对比,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控诉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的伤害。“这种对繁华市井的描写和对战争惨烈景象的描写,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,相辅相成,表达了对侵略暴行刻骨铭心的痛恨。”

书中不仅写了重庆大轰炸,还写了四川嘉定(今乐山)大轰炸。祝勇颇为感慨的是,面对战火,川渝人民的坚强乐观,也为故宫文物南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。“这种坚强乐观是很值得学习的一种品质,让故宫人在西南大后方感受到强烈的信任感。我在调研采访过程中有许多切身体验,比如我在重庆看到一张大轰炸后的历史照片,楼房已经被炸塌了一半,但另一半作为饭店还在照常营业,还在卖包子、油条之类食物。还有在废墟里,重庆人还在打麻将。你看,炸归炸,日子还照常过得。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、包容精神滋养了坚守抗战的人民,更为文物南迁这一保全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坚实支撑。”祝勇注意到,重庆不久前提炼出“坚韧、忠勇、开放、争先”的城市精神,他认为这一表述高度契合重庆的城市特质,承载往昔,映照未来,概括了这座城市一路走来的风骨

与灵魂。
以史为镜
“回望九死一生的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‘流亡路’,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”

文物有情,文脉相牵,大国器物之上凝结的是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。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曾说:“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价值,在于希望人们在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有反思、有鉴戒、有以历史为镜的态度,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。”在祝勇看来,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对于今人也有“以史为镜”的意义,“文物南迁九死一生,多年后大部分重返北平,回望这条史无前例的国宝‘流亡路’,不单对故宫人,我想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精神洗礼。”

以《国宝》为题,祝勇全力以赴,孜孜以求,以这部长篇小说完成了对历史的建构。祝勇希望深掘藏在文物背后的人性、人心,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探寻文明变迁和精神来路。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源于五千年历史文脉,岁月交替,文脉赓续,在今天依然在滋养着我们。”他说,在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观里,往事并不如烟,“它可以通过物质凝聚、固化。人所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精神综合体,是历史,是哲学,也是法度。”

从2002年的《旧宫》算起,《国宝》已经是祝勇笔下第12部故宫主题作品了。20余年,洋洋洒洒数百万字,祝勇构建起的“纸上的故宫”,亦是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。

执着书写故宫的根源,在于祝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痴迷。如今,已经成为新时代资深故宫人的他,这样回忆与故宫的几十年缘分。“我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,经常逛故宫,故宫的美我怎么都看不够,至今我去看那些巨大的宫殿仍然无比震撼,因为故宫的确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,渐渐故宫就成了我的写作主题。”祝勇表示,“从器物、历史等不同面向的丰富角度去不断书写故宫,可以呈现一个开放的故宫,一个让文物活起来的故宫,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故宫、读懂故宫。读懂了故宫,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,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就是中国人的‘精神家底’,它将永远滋养我们的心灵。”



■新重庆—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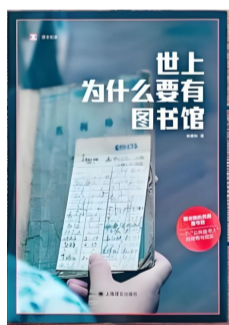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管过去了多少年,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,丈夫那文松在薄雾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,是公元1933年2月5日。”

这个富有韵律的句子简洁有力,在看似从容不迫的氛围中,那文松和梅遇影的命运渐渐“失控”,涓涓细流的儿女情长与波澜壮阔的家国情怀奇妙合流。他们的人生,即将开启未知的旅程。

那未知的旅程,与故宫文物南迁的隐秘征途密不可分:1933年2月,山河飘摇之际,如那文松般的故宫人,带着首批13427箱零64包

【百本好书送你读】

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 看杨素秋在西安造梦



■姚伟民

1000多年前,李白来长安寻梦,最终却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差了“三万里”。

1000多年后,杨素秋在西安造梦,哪怕隔着“三万里”的距离,她也在努力让区县图书馆的梦想照进现实。

这个苏州大学博士毕业的80后,在陕西科技大学教书的老师,凭借着一次在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挂职锻炼的机会,迈出了大学校园。当她真正面对着嗷嗷待哺的群众时,她的想法是为碑林区建成一座图书馆。

然而,当一个理想主义者进入官场,欲将想法付诸实际时,她才发现,面临着重重阻力。充满形式主义的文件,“报喜不报忧”的宣传方式,唱高调、不落实的工作态度……这一切的一切都横亘在杨素秋面前,几乎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。

更加糟心的是,她不仅要面对充满惰性的体制,还要面对着并不“文明”的群众。她在书中写道:“实地调查结果出乎意料,许多老百姓不清楚图书馆是做什么的。我去了五家社区服务中心,遇到的人都没听说过附近新开了图书馆。”他们对图书馆的误解令人啼笑皆非,有人询问图书馆的书为什么不卖,打几折,有人站在图书馆门口徘徊,担心里面按时收费……

上上下下的阻力似乎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写照,小时候“中原北望气如山”,长大后“求田问舍”,只求活得温饱。于是,平凡成了我们的共同标签。但是,任何时代总不乏杨素秋这样的人,他们怀着对时代的悲悯,即使有无法跨越的大山,他们也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奔走呼号。

杨素秋呼吁方式是著书写作,于是我们看到了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这本纪实文学作品的问世。

在书中,我们看到了理想、美好与希望,至少有两个人令我印象深刻。一个是“小小志愿者”乐乐。8岁多的乐乐读三年级,在把图书整理上架的过程中,她先被拖车里的绘本吸引,竟全然忘记了自己是“图书管理员”。她倚着车看书,又把妈妈拉过来念给她妈妈听。从一个“小书虫”到“管理员”,乐乐以一种可爱的姿态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书籍的着迷。

另一个是盲人读者杜斌。他开了一家盲人按摩店,帮“我”按摩时和“我”一起聊毕飞宇的《推拿》。他们有个小小的读书团体,聚在一起讨论时,有的盲人说毕飞宇写的盲人世界不完全准确。但杜斌却不这样认为,他理解毕飞宇,认为毕飞宇把盲人的感受还原了百分之八九十。尽管在很多事上,他都要比正常人多做几遍,但是他热爱生活,热爱读书。“他看不见大海,但舍不得走,在水里站了很久。”这大海,不仅仅是他去过的青岛海滩,更是他心里波澜壮阔的“大海”。

每个有趣的人都和乐乐一样,对某种事物着迷;每个热忱的人都和杜斌一样,凭借心里的波澜壮阔抵御生活的不幸与不公。而作者正是如此,她对书着迷,半生钻在书里,她想让书惠及更多的人,于是她致力于为蓝田建造一个图书馆。这个宏伟的蓝图并不容易照进现实,但是无论经历怎样

艰难困苦,我们还是看到了碑林区图书馆的建成。

现在,让我们来回答一个终极问题,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?

如果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话来说,图书馆应当是人间天堂;如果用杨素秋从教科书中总结的话来说,是因为图书馆有三大功能:一是保留人类文明优秀成果,二是宣传教育,三是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,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公平性。我想,杨素秋真正的目的,想必是致力于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,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公平性。

尽管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,但我们发现,已经有许多仁人志士竭尽所能去弥补它们。而杨素秋正是其中之一。虽然她挂职时碑林区图书馆并没有建成,但我们知道,这座图书馆的最终建成与她的推动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杨素秋曾在2024年的一次采访中,谈到了“一边做官一边自省是可能的吗”这样的相关话题,从她的经历来看,是可能的。作为挂职干部,她真正有着一颗为民服务的心;作为知识分子,她试图让梦想照进现实。

这世上熙熙攘攘有许多人,来来往往有许多事,抛却功利利禄外,总要有一些人,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,真正地吧福祉落实到人民群众手里去。我相信,区县图书馆会越来越多,那些尚未被知识照亮的角落,终要被照亮。



近悦近来书香重庆
书评投稿邮箱: cqrbdsb@163.com

《王氏之死》 透过历史切片向我们传递温度



■泥文

小人物命运的运行是事件发生的本身,也是时代进程中编年史的落脚点。这是我看了历史性叙事书籍《王氏之死》产生的想法。

美国诗人詹姆斯·梅里尔说:“逝去的,被埋葬了吗?还是又一块缺失的碎片?”很显然,历史学家史景迁(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、汉学家)用他的方式从大量的史料中撷取散落的历史碎片,缝补1668年到1672年间发生在山东郯城人身上的故事,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切片,让我们从中去认识、感受和体悟那个历史阶段的中国,客观地反映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抹掉的事实。

《王氏之死》是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一种叙事文本,使人读来轻松易懂、易记,不像学术性太强、太专业化的历史读物那样呆板,却是在尊重历史、书写历史的情况下展开的。据附录,其参考文献达56种之多,注释数百条之多,从这里可以看出,史景迁在动笔之初是做了大量的考证和功课的,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可见一斑。《王氏之死》的写作,史景迁是持悲悯情怀的,在还原一些故事的情况下,揭示了清朝时期的平民、小人物,在政治境况和自然境况双重盘剥

之下的艰苦苦难程度,且在女性身上凸显得更加淋漓尽致。

史景迁在序里说,《王氏之死》是在4次小危机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写作的。一次是“土地耕作及赋税征收”,一次是“一名寡妇试图保护其子嗣及遗产”,一次是“地方恩怨引发的暴力事件”,还有一次是“姓王的妇人无法再忍受生活现状,选择逃离郯城”。就本书的组成部分看,书名为何叫《王氏之死》?正如史景迁所言:“本书始于妇人王氏,自然也终于王氏。”也就是说,她引我进入郯城,引我发现郯城历史的可悲,引我第一次了解一个在所有可见的财富、影响力和权力都分配不均的边缘县城。”

郯城在清朝康熙年间及以前是什么样子的?据1668年任郯城知县的冯可祥,1670年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编纂的《郯城县志》,以及黄六鸿卸任后的回忆文章显示,郯城在天灾(地震、蝗虫、洪水、雪灾等)、人祸(白莲教、土匪、清军入关等战乱)面前,地震死之、匪患、兵乱杀之,无食饿而死亡之……“四年之奇荒,七年之地震,田禾颗粒无收,人民饿死大半。”有因无法生存而自尽的,也有因生存而卖妻卖女的。尽管在如此条件下,赋税、兵役的摊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,成为悬在郯城人民头上的一把血淋淋的利刃。本就弱势的女性群体,在这样的境况下就更不值一顾了。

《王氏之死》引用了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里《盗尸》《上仙》《偷桃》《绿奴》《促织》《绩女》《细柳》等故事。借他收集的来自亲友讲述、游历见闻的民间轶事,为《王氏之死》的写作铺陈肌理。这些奇闻异事、奇思妙想的故事,从表面上看,史景迁对它们解读阐释,其实他是用了一种反证的手法来证明是时大环境

下平民、小人物的生存状态,用这种状态来反映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,也用这种方式让那一时期发生在郯城人身上的故事活泛起来。

《王氏之死》涉及的妇女故事不只是王氏,作者还列举了一些比较典型的故事。当然,多数是借了蒲松龄之手,也深入到了大清律例的底色。如,“其改嫁者,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,并听前夫之家为主。”“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,合承夫分,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。”也因这些条例给成了寡妇的妇人带来了悲惨的命运。族人会想方设法让守寡的女人改嫁,以期获得本该属于她的财产。更有甚者,用计谋杀掉守寡妇人和她的孩子来占有其财产。如《郯城县志》有简短传记:“是时,家业尽空,兵荒盗起,人无宁居。氏以弱孀幼子,孤伶苦守。族人又逼嫁而谋其产。氏毁容破面,死不再适。”诸如此类,无一不彰显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和弱肉强食的本色。

作为一位外国汉学家,史景迁站在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角度,去挖掘王氏所代表的广大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,以及这种命运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。我们能看出他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同情,这是他试图跨越历史与文化鸿沟,以一种更贴近人性的方式,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中被忽视的平民、小人物的温度。

《王氏之死》是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历史读本,作者用严谨的笔触挖掘史料,借《聊斋志异》故事里的奇幻,为我们与彼时的平民和小人物之间搭建了一个通道。其用笔是理性与悲悯、事实与想象、沉重与浪漫相互糅合、相互渗透的。他用层层剥茧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清朝时期郯城人民的情状。彼时政治与经济、自然与人文、朝堂与民间、男性与女性等之间的关系具现,如亲见般震撼人心。